

文学论丛

梅溪集

黄 齋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文 学 论 丛

梅 溪 集

黄 裔/著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

梅溪集

黄裔/著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

(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3 楼)

福州台江建隆彩印厂印刷
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 223 千字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962-450-094-0/D · 45871

定价：港币 2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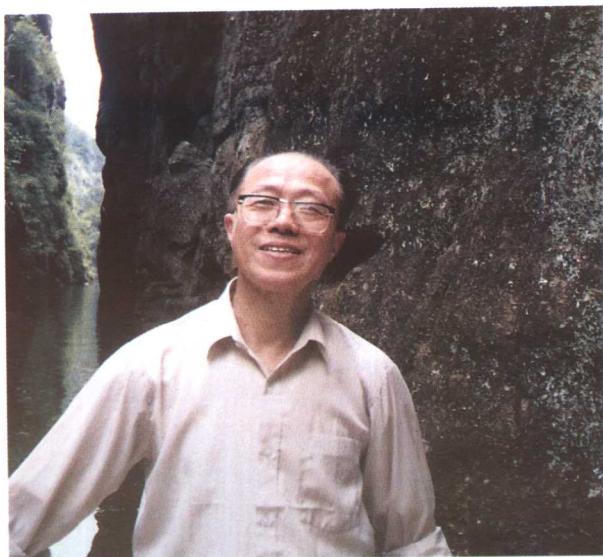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人民币 17.5 元

老舍国际会议期间，作者拜访老舍夫人、画家
胡絜青先生



老舍国际会议期间，作者夫妇（左一、二）与史承钩教授夫妇合影留念

作者摄于大金湖上下一线天



作者（左一）在第九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

目 录

- 郁达夫小说：呼唤人性的复归 /1
论郁达夫的自卑情结 /14
郁达夫与传统理欲观 /27
论“沉沦小说派” /37
老舍郁达夫人品比较 /64
老舍郁达夫文品比较 /79
略论“新冰心体”的艺术风格 /95
无意树旗帜却成为旗帜
——冰心人品谈片 /104
《战士和苍蝇》考辨 /115
追本溯源：重探现代评论派 /129
现代文学史与文学流派 /149
巴金的《激流三部曲》 /159
老舍的市民小说 /173
琉球汉诗初探
——论中国诗歌移植的硕果 /187
再探琉球汉诗 /206
三探琉球汉诗 /215

四探琉球汉诗 /228

五探琉球汉诗

——程顺则和《雪堂燕游草》 /241

现代作家生活掠影 /258

丁玲婚恋传奇

铮铮铁汉在狱中

根植侨社的作家

封建婚姻的坚决叛逆者

人民的艺术家

爱国诗人

文学元老的爱心

鲁迅是人不是“神”

后记 /320

郁达夫小说： 呼唤人性的回归

“五四”文学革命以来第一部小说集《沉沦》，最先以“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”（成仿吾语），一枝独秀，吐艳艺苑，郭沫若、成仿吾同声应和，随即波及创造社内外，追随者纷至沓来：倪贻德、周全平、严良才、叶鼎洛、王以仁、冯沅君、贺玉波、林如稷、陈翔鹤……浩浩然形成流派，蔚为奇观。郁达夫启蒙小说，影响社会各阶层，唤起评论界争鸣，并带来“社会上、道德上的变动”，正如作家锦明当时指出的：“今日公开的性的讨论，那神圣的光，是《沉沦》启导的；今日青年在革命上所发生巨大反抗性，可以说是从《沉沦》中那苦闷到了极端的反应所生的。”

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，最早大量表现性意识的是郁达夫。这位大师，就其文学创作影响而言，小说则远在诗词、散文之上。而他的小说，正是以大胆描写性意识，形成一道荡涤封建道德戒律的冲击波，起了郁达夫所主张的“启发人智人性”的伟大作用。综观他一生创作的 44 个中短篇，不同程度触及性意识的就有 40 篇，占 91%。独具慧眼的胡愈之 40 年代就敏锐地指出，郁达夫的“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，一个人文主义者，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。”诚然，这位文学巨匠，站在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立场上，以个性主义为精神武器，大胆描写性苦闷，向腐朽的封建伦理和性道德勇敢挑战，不愧

为中国现代热烈呼唤人性复归的启蒙小说家，现代小说史上反传统道德戒律的先驱者。

有中外专家学者参加的纪念郁达夫殉难 40 周年学术讨论会指出，过去对郁达夫及其作品的评价并不全面，他的作用与影响尚未被人充分认识。这是事实。本文拟从反对压抑人性、追求人性复归的角度切入，对郁达夫小说作些思考与探索。

—

中国是个对性问题极敏感的国家，但要研究郁达夫小说，却不能绕道通过。既然面对客观存在，就只能借助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和唯物史观，找出正确结论。

中外古今哲人、名人、文学家，都不曾回避性和性的主题。且不说孔、孟的“食色，性也”等语录，奥·倍倍尔也说：“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中，继饮食的需要之后，最强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。”马、恩、列也有诸多论述。恩格斯认为，“生活资料……的生产”和“人类自身的生产”，是“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”⁽¹⁾。这“两种生产”，指的不正是人类食色两种本能吗？他还说：“体态的美丽、亲密的交往、融洽的旨趣等等，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欲望”⁽²⁾。这些论述，都说明性爱和繁衍后代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。

文学是人学，文学要表现人性、张扬人性，这是众所公认的命题。而两性关系、性爱，则是人性的主要内容之一。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的描写内容和审美对象。恩格斯赞许德国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的长处“就在于表现自然的、健康的肉感和肉欲”⁽³⁾，还说：“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……竟成了

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。”⁽⁴⁾ 另方面，他又无情揭下一位“喜欢听猥亵的小故事”却又回避表现性欲的诗人之虚假外衣：“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，的确就会想到，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。”⁽⁵⁾ 可见，恩格斯肯定性爱、“肉感和肉欲”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文学描写的题材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先驱薄伽丘，将爱情看得高于人的一切其他本性，他那部被郁达夫誉为“中世纪文学的一个宝库”的《十日谈》，是关于爱情自由的美学宣言，向假仁假义的耶稣教道德发起挑衅。从启蒙意义上说，笔者认为，称郁达夫为中国的薄伽丘，似也恰切。

中国三千年封建专制窒息人性，扼杀人权。长期积淀下来的心理重压，造成了民族心理麻木的一个侧面：性的无知。礼教和文明的镣铐对情欲的严重禁锢，致使人民心理的深层结构中，都留下性爱分裂的痕迹。在华夏古国，做一世夫妻，拥成群子孙，挨挨挤挤，浩浩荡荡，却未必意识到异性爱的幸福，嫁娶几乎纯为延续香火。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”的教条，万民世代信奉无疑。阿Q向吴妈求爱，其表层意识岂不与怕做鬼挨饿有关？李顺大三度造屋，岂不是从“繁衍”需要出发？柔石描绘的典妻陋习，岂不是赤裸裸地将女人当生育工具的明证！？

历代作家，背负着传统文化心理的十字架，其作品往往暴露出历史惯性带动其性心理中的伦理情感，性爱分裂的痕迹也自然显明。纵然是大师曹雪芹，其性意识也难免情理分离、爱欲对立。宝、黛情深意切，却冰清玉洁，毫无杂质；而宝玉虽同袭人试过“云雨情”，却无一丝爱昧。因为在曹雪芹美学思想中，性生活让贾琏那班浊物弄脏了，所以作家不忍心让性的笔墨“玷污”宝黛圣洁的爱情。正是长期的性禁忌和性压抑，造

成作家的畸形性意识，并产生相应的文学意识：性爱性爱，不削沾性，只许写爱。这种现象，渗透于“五四”前的一般作品中。总之，在人们性观念里，或则只承认爱情是神圣高尚的，而认为性欲是卑污下贱却又不可少的；或则将性欲与淫荡划等号。前者是畸形的性观念，后者是无性的传统意识，由它孕育出无性文学；而无性文学又加深了无性的传统意识，从而给民族心理造成巨大空白。严格说来，中国并没有性文学，却只有茅盾批评的那种虽加严禁却蔓生滋长的不算文学作品的“性欲描写”，因为“自始走进了恶魔道，没有正当的性欲描写的文学”。《金瓶梅》作者深怕恶谥加身，施了隐身法，致使考证“兰陵笑笑生”成为一大难题。足见在儒教统治时代，性欲小说决然得不到合法席位。茅盾分析中国出现性欲小说的根本原因是：对“禁欲主义的反动”和“性教育的不发达”⁽⁶⁾，正切中肯綮。

郁达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在于，更新了文学观念，拓展了道德领域和心理范畴的空间。在传统文学中，未见作家笔触深入到人（特别是作家自我）的内心世界、感情世界，即刘再复说的“人的精神主体”，“内自然、内宇宙”；更未见作家笔触出入于赤裸裸性心理的压抑和伸展之间，让读者洞察到主人公（特别是作家自我形象）那真实的、不加修饰的内心世界的奥秘。郁达夫无视传统性道德，把伪君子认为必须深藏的隐私丑恶，毫不讳饰地披露人前，甚至达到使伪君子不敢正视的地步。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把郁达夫喻为“裸露台上，任人观赏的疯人”，誉为“脱除一切隐饰，暴露自我”的“大勇之人”。作家敞开精神门扉，使读者第一次发现“内宇宙”原来无比复杂，深不可测！使读者发现人的内心世界里还有个更内在的世界，感情世界中还有个秘密世界。可是，郁达夫描绘的“内

宇宙”大千世界，不是充满喜悦的天国乐园，而是备受折磨的阴曹地府、阎罗十殿。在他笔下，人的个体意识、感性生命正从冬眠中复苏、觉醒，情欲正在崛起、跃动，要求释放、满足。然而，一幕幕悲剧令人肝胆欲裂：封建道德枷锁扼杀人的天性，异邦域外的民族歧视，压抑弱国子民的正当情欲。“真正艺术家”的良知，驱使郁达夫举起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，拿起心理解剖的手术刀，大胆插进人的灵魂深处，揭开隐藏在性心理深层的秘密，暴露出伪君子们在满口“仁义道德”的极度禁欲的画皮下隐藏着无度纵欲的恶德丑行，使得潜意识层的情欲，象长期蕴蓄地层下的岩浆，一旦有了突破口，便令人惊叹地喷涌而出！试问，若非刺到“道学、假才子们”的要害，怎会“震惊得至于狂怒”而“痛骂”（郭沫若语）？“道德家”怎会“大为光火，认为那种颓废气味足以败坏人心”（夏志清语）？

郁达夫启蒙小说，创造一系列旨在呼唤人性复归的自我形象，以控诉扼杀人性的封建制度。正是在这点上，郁达夫小说根本不同于那些教唆吃喝嫖赌、赞赏兽欲鬼窟，神魂颠倒于色情游戏，无耻展览性行为，以挑逗情欲的典型狭邪小说、叶灵凤小说和张资平的“△”。因此，文学史容纳了郁达夫，浪淘尽乌七八糟之辈。

二

凭着艺术家的敏感性，郁达夫发现“中国的国民性，早已被三千年来的道德虚伪所腐化了。”⁽⁷⁾因此，他从特定角度、以特殊题材，揭露虚伪的传统性道德，抨击“吃人”的腐朽名教，实现他对个性主义的热烈追求。鲁迅为“五四”文学开拓了“人”

的主题，郁达夫则拓展它“人性”的一个侧面。如果说，《狂人日记》是对“吃人”的封建社会发出第一声战斗呐喊，那么是否可以说，《沉沦》集是对“人性复归”发出第一声充满野性的呼唤？

郁达夫启蒙小说，弥漫着浓烈的抨击封建道德的火药味。它崇尚人的价值，尊重人的自然本能，大胆肯定七情六欲的合理性，把个性、情欲从封建礼教牢笼中解放出来。作家以“异端者”姿态出现文坛。一反“古圣昔贤的明训”，冲破传统文学的“禁区”，理直气壮地提出：“从前的人，是非礼弗听，非礼弗视，非礼弗……的，现在可不同了。一样的人体的一部分，为什么肚脐以下，尾闾骨周围的一圈，就要隐藏抹杀，勿谈勿写呢？（这是霭理斯的意见）。”⁽⁸⁾ 霍理斯是英国研究性心理和优生学的医学博士，郁达夫特援引他的话，以否定孔子“非礼弗……”的“非人”公式。正是科学的方法论和唯物史观，支持了郁达夫的立论。

郁达夫“自叙传”小说，有着或隐或显的连续性。正如巴尔扎克《人间喜剧》中的拉斯蒂涅一样，于质夫也在六篇作品中反复出现。于质夫、质夫、姓于的、Y君、文朴、达、伊人等，既是系列形象，又是“自叙传”作者不同角度的投影，但却有着一以贯之的个性气质。这要另文专述。

郁达夫一生小说创作，大抵可分三个时期，主要刻画三个“弱者”形象系列。但不论是哪个系列，都发出一种对人性复归的呼唤，也都孕育一种被压弯了的灵魂的反抗。虽然主人公在不同时期反抗形式各异，却并不难找出其性心理的发展轨迹。

一、留日后期（1921—1922）——弱国子民形象系列：受凌辱与无爱之苦，人性遭到摧残，乃放浪形骸，自我作贱，忧悒颓唐。——这是病态的反抗。

《沉沦》集、《胃病》、《怀乡病者》和《空虚》中的主人公形象，其性心理大都表现为胆怯、自恋。他们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，却备受异国歧视，感性本能遭到压抑，只得在沉沦中挣扎，在堕落中呼救，但也从中萌生出自发的反封建要求和反帝意识，这都是些个性主义者，患有时代忧郁症，其“受伤的灵魂”发出凄楚哀切的呻吟：

若有一个妇人，无论她是美是丑，能真心真意的爱我，
我也愿意为她死的。（《沉沦》）

二、归国初期（1922—1927）——零余者形象系列：才华横溢，却报国无门，贫病交加，乃“以一己的力量，来拼命的攻击这三千年来的恶势力”，或“以一枝铁笔来挽回那堕落到再无可堕落的人心”⁽⁹⁾。——这是无力的反抗。

这些形象，“袋里无钱，心头多恨”（《零余者》），自怨自艾是“一个生则于世无补，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”（《茑萝行》）。论性心理，他们是大胆而颓唐，且认为宣泄于性欲是理所当然的：在“人性解放了的现代，个人的自我主张，自然要与古来的传统道德相冲突的”，年青人与“几千年来的幽灵”“战得精疲力竭”，“倦颓”，“悲观”，“精神萎顿”时，“只好去寻求官能的享乐”⁽¹⁰⁾。于质夫往花街柳巷前的答话，就震响着对野性的呼唤，显示出大胆而颓唐的性心理：

色胆天样的大，我教员可以不做，但是我的自由却不愿意被道德来束缚。（·为引者所加）……那些想以道德来攻击我们的反对党，你若仔细去调查调查，恐怕更下流的事情，他们也在那里干哟！（《秋柳》）

这固然是一种被扭曲的反抗，但主人公对个性自由的追求，是多么强烈，对伪君子们传统性道德的揭露，又是何等无情！《范

茫夜》、《秋柳》、《寒宵》、《街灯》和《祈愿》中的主人公，在无路可走时，去狎妓自醉，买笑当哭。人文主义者郁达夫，避去轻佻的挑逗、肆意的引诱，避去主人公求欢后洋洋自得的醉态，而着重从人的七情六欲中解剖性本能所受的社会压抑。这些主人公都是流着眼泪求欢，怀着道德纵欲的。“向善的焦躁与贪恶的苦闷”（《茫茫夜》）的矛盾，交织在一幅幅画面中。主人公变态的分裂心理，随处可见。他一面放纵情欲：“沉索性沉沉到底，……试看酒色的迷力究竟有几多”（《祈愿》）；一面痛责自己：“我真是以金钱来蹂躏人的禽兽呀！”“我是违反道德的叛逆者，我是戴假面的知识阶级，我是着衣冠的禽兽！”（《秋柳》）麦克开勃称萧伯纳为“最有道德的不道德家”，“最洁已的十诫否定人”，若移用来评价于质夫，似颇恰切。若仅就爱欲统一这点而论，于质夫岂不比鲁迅、巴金笔下的伪君子四铭、高尔础、高老太爷、冯乐山更具有“人性”？岂不比性无知的闰土、祥林嫂更具有“人性”？岂不比灵肉分离的封建礼教殉葬品觉新、钱梅芬更具有“人性”？“迷羊”王介成形象的塑造，在郁达夫全部小说中似是达到追求和满足肉欲的顶峰；但另方面，作家正是借主人公的痴情与狂热，作为自家的回顾与忏悔。

作家写弱国子民“性的苦闷”和零余者“生的烦恼”，实质上是厨川白村说的社会和时代的“苦闷的象征”。郁达夫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，宣泄这“苦闷”，但他的人道主义往往以报复主义形式表现出来。

三、动乱年代（1927—1936）——隐退者形象系列：败阵于人生战场，遁世隐居，回归自然，寻求解脱，——这是消极的反抗。

这时期，好些篇章都流露欲情净化的心理。乍看起来，

它与表现性苦闷背道而驰，实则仍属于呼唤人性复归的母题。因为从性爱“净化”为情爱，表明作家在写灵肉冲突中，灵战胜了肉。不过，细加琢磨，异性间心心相印的“灵”，仍离不开“肉”，离不开性爱的基础。

早在留日初期，郁达夫就抒发过归隐的情怀。至小说创作后期，反传统性道德的叛逆精神明显减弱，而向佛道思想、基督教忏悔意识靠拢，出世思想和田园风味已明朗化。郁达夫誉之为“大自然的骄子”卢梭所主张的“归依自然”，不仅是要回到美丽的大自然，更是要回到人的自然本性，这也是对“自我”的肯定。卢梭“爱好自然，诅咒现代社会的堕落，……想归返到原始时代的自然状态去”⁽¹¹⁾。郁达夫则面对“堕入衰运，流于淫靡”的艺术品，当头“棒喝”，令其“‘归向自然’，‘回到天真’上去”⁽¹²⁾。卢梭和郁达夫都认为，人类本是纯洁、天真、自由，同自然一体的，自从进入阶级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，就堕落了，人性中的性欲开始异化，郁达夫“对现实感到了不满，才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怀中”⁽¹³⁾，这是因为“山水，自然，是可以使人性发现，使名利心减淡，使人格净化的陶冶工具”⁽¹⁴⁾。正是在这种文艺观指导下，后期小说多有自然美景“净化”人物心灵的描写：五云山的景色，净化了郁先生的“一念邪心”；马缨花的温馨，净化了“我”的欲情；胜果寺的醴泉，涤净了秦国柱脑膜上佳人的印痕；陈逸群投入西湖山水怀抱，以摆脱情网；决计禁欲养身的文朴，向往徐竹园超脱世俗的生活……这些作品，归根结蒂，仍不离表现“灵”“肉”冲突，但明显地向“灵”倾斜。

综观郁达夫的性心理和性道德观，其发展轨迹，似是兜了一个圆圈：起点接近终点；从反对性禁锢，到自觉趋向性淡漠；

从有意识地背叛传统，到无意识地回归传统，显见作家传统文化积淀之深，以及世界观充满矛盾。

无庸讳言，郁达夫笔下出现过性变态心理的刻画，如自性爱、同性爱、亲属爱、恋物症、被虐待症等，这些转化了的性欲，给时代画卷染上几点墨污。但从另一角度看，也正是凭着一个个人物的怪异病状，才得以准确无误地诊断病入膏肓的社会，也从而得知黑暗时代给青年造成的生理损伤、心理损伤是何其严重！

三

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总体框架上确定郁达夫小说的开拓性地位，须从纵横两向加以审视：一从横向审视欧美、日本文学对他创作的影响，如何在中外文化撞击中形成离经叛道意识；一从纵向审视他如何在反思传统文化意识中痛苦觉醒，对人性复归发出呼唤。

从横向看，郁达夫小说融汇着多元的外来影响。留日十年，遨游于世界文学之林，仅在八高四年间，就读了一千部左右的俄德英日法小说，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欧洲的浪漫主义、自然主义、唯美主义和日本“魔鬼派”、“私小说”等流派的影响。同时，他又善于批判继承，大胆创新。屠格涅夫是他最喜欢、接受影响最大的作家，也是他小说创作的引路人：“我的开始读小说，开始想写小说，受的完全是这位……北国巨人的影响。”⁽¹⁵⁾ 郁达夫笔下的“零余者”形象，同屠格涅夫笔下的“多余”（郁达夫《零余者》中的 Superfluous man 即译为“多余”）形象有着精神上的血缘关系。只是郁达夫小说增加了浓重的感